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吴愈晓 杜思佳

提 要：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规模、质量、公平和国际影响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发展不均衡和“大而不强”的挑战。本文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走过的道路，在审视中国高等教育分层的本土依据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归纳了当前社会历史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最后，本文提出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应坚持内涵发展，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并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努力满足人民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新时代高等教育的研究应基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变化进行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中国 改革开放四十年 高等教育发展 研究综述 教育分层

一、导 言

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视野里，教育既是个体地位获得的最主要渠道，也是实现社会公平和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制度设置。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关乎国家进步与民族复兴，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更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一个历史阶段。回顾和总结近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对开启新时代全面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新征程有较重要的意义。

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事业不断做出新的指示和部署，先后启动实施“211工程”、“985工程”和“2011协同创新计划”，并从2016年开始部署高等教育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简称“双一流”建设）。通过这一系列推动高等教育规模和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的高等教育实现了量和质的飞跃。《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2016年底，全国各类高等教育的在学总规模达到3699万人，绝对数量居世界第一；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此外，高等教育质量切实加强，科学研究质量稳步提高。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160.20万人。专任教师学历层次持续提升，部分学科已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教育部，2017a，2017b；人民网，2017；张男星等，2015）。总而言之，我们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并成功实现了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转变。

同时我们也已经深刻认识到，高等教育在近几十年取得巨大发展成绩的同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或挑战。首先，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和均衡发展是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高等教育虽已进入大众化阶段，但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依然存在，大部分高等教育资源都聚集在东部省份。根据2016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贾毓慧，2016），截止201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高等教育比例最高的是北京，为54.6%；上海次之，为45.5%；远超过西藏的10.3%和贵州的10.2%。^①总体而言，高等教育的地域均衡发展和不同地区或阶层的居民的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状况有待进一步改善。其次，提高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也迫在眉睫。虽然在规模上我国已经实现了人力资源大国的目标，但是我们离人力资源强国仍有一定的距离，高等教育在科研创新能力以及人才培养的质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将简要回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走过的历程，重点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挑战，并对社会学领域关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文献进行综述。文章的最后对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研究提出展望和建议。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简要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① 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是指20至59岁劳动力人口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的比例，本指标用于考察主要劳动年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可作为教育效益类指标。主要劳动年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越高，表明劳动者主体人员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越多，代表人力资源水平越高。

可称作高等教育的奠基阶段，起点是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初具规模。但由于历史原因，高等教育曾一度陷于停顿。1977年开始，我国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邓小平指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在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他提出教育应优先发展的思想，把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放在现代化建设的首位。

第二阶段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阶段。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了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要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教育部，1993）。“211工程”是面向21世纪，中国政府集中力量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争取有若干所高等学校在21世纪初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学术水平，共有112所高校被纳入该工程（教育部，1994）。1998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在“211工程”的基础上，做出了将39所国内知名高校列入国家跨世纪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名单（即“985工程”）的重大举措（教育部，1998）。“211工程”和“985工程”以国家财政经费支持的方式提高中国高校办学水平，对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带来很大帮助，一批重点高校、重点实验室迅速发展壮大，培养了大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人才，成为贯彻落实党的“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举措。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起点是1999年的大规模高等教育扩招。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数仅为108.4万人，而1999年招生人数达159.7万，较上年增长47.3%。在1999年至2005年间，高等教育每年扩招速度在20%以上。到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6.7%，全国高等教育机构3613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442所，普通高校学校的数量和比例持续增加。除了高等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之外，2012年5月，继“211工程”和“985工程”之后，我国正式实施高等教育领域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2011计划”）。“2011计划”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以创新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通过构建面向科学前沿、文化传承创新、行业产业以及区域发展重大需求的四类协同创新模式，必将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教育部，2013）。

第四个阶段是高等教育内涵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带领下，我国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多次对教育发展和改革事业进行指示和部署，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完善以章程为统领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全国普通本科高校章程制定核准工作基本完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把“建设教育强国”确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并将“双一流”建设作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内容。“双一流”即“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党和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双一流”的建设以学科为基础，通过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来强化高校的内涵建设，带动整体高等教育内涵发展。

三、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成就和面临的挑战

（一）高等教育发展成就

总体而言，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高等教育在规模、质量、公平和国际影响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首先是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①仅为1.56%，本专科及研究生在校数为85.71万人。199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3.4%，高中升大学的升学率^②为27.3%。1998年扩招后，无论是学生数量、教师数量，还是硬件设施和教育支出，高校规模从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突破。199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升至10.5%，同年高中升学率为63.8%。2002年高中升学率达83.5%，从2003年开始高中升学率有小幅回落，2007年降至70.3%。截止2016年，高中升学率升至94.5%。1990至2016年间，高中升大学的升学率虽有起伏，但整体波动上升。此外，201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0%，2016年毛入学率为42.7%。总体而言，1990至2016年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高中升学率呈现大幅的上升趋势（图1）。

根据1990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国家教委计划建设司，1991），1990年普

① 某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于某学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除以某年全国18~22岁人口数。

② 高中升大学的升学率为普通高校招生数与普通高中毕业生数之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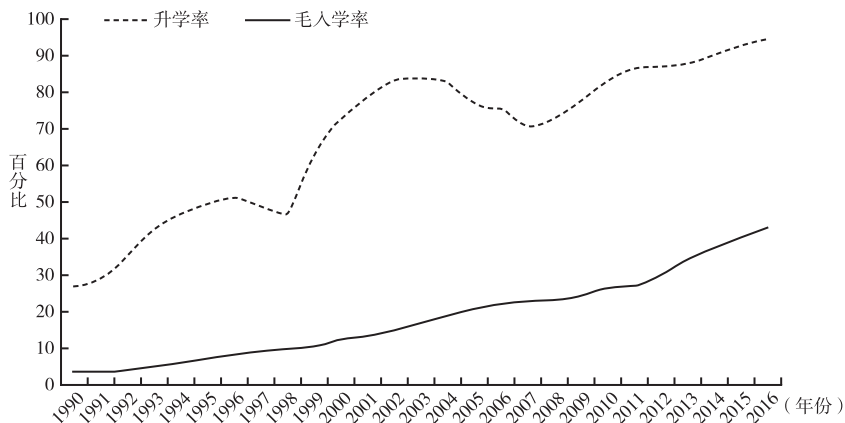


图1 高中升学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90—2016（年）

数据来源：升学率（《中国统计年鉴 2017》），毛入学率（教育部，2010，2015，2016a，2018）。

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共 2,062,695 人，其中普通本科在校生 1,320,124 人，普通专科在校生 742,571 人。1990 年全国在学研究生共 93,018 人，其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11,345 人，攻读硕士学位在学研究生 80,685 人。而《2017 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显示，2016 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总规模已经达到 3699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2.7%。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2880 所，比上年增加 28 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2596 所（含独立学院 266 所），比上年增加 36 所。在学研究生 198.11 万人，比上年增加 6.96 万人，其中在学博士生 34.20 万人；在学硕士生 163.90 万人。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 748.61 万人，比上年增加 10.76 万人；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 2695.84 万人，比上年增加 70.55 万人。其中普通本科生 1612.95 万人；普通专科生 1082.89 万人。另外，2016 年，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 211.23 万人，比上年减少 25.52 万人；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 584.39 万人，比上年减少 51.55 万人。整体来看，1990 至 2016 年间，我国各层次在校生规模显著提高（图 2）。

2016 年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 240.48 万人，比上年增加 3.55 万人；专任教师 160.20 万人，比上年增加 2.94 万人。普通高校生师比为 17.07:1。普通高等学校校舍总建筑面积 92671.05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455.86 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4514.42 亿元，比上年增加 456.82 亿元。另外，2015 年教育经费执行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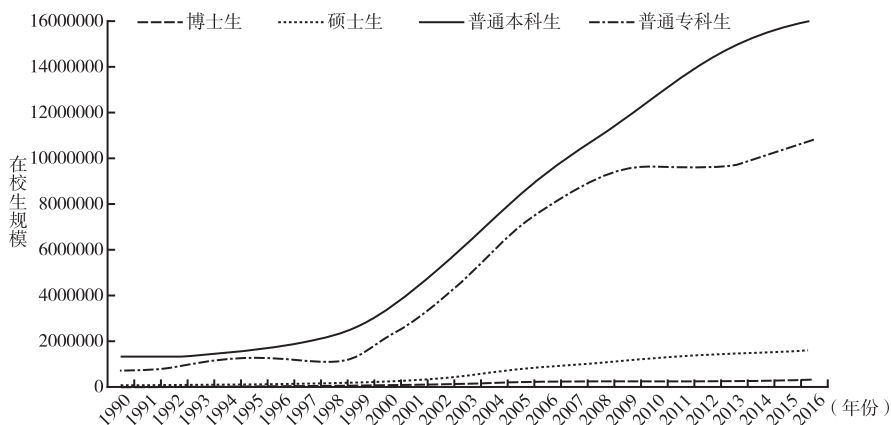


图2 普通高校各层次在校生规模，1990—2016（年）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6，2013，2012，2011，2010，2009，2008，2007，2006，2005，2004，2003，2002，2001，2000，1999，1998，1997，1996，1995，1994，1993，1992，1991，1990。

统计公告显示，2015年我国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6129.19亿元，全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包括教育事业费，基建经费和教育费附加）为25861.87亿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为18143.57元，比上年的16102.72元增长12.67%；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持为8280.08元，比上年的7637.97元增长8.41%（教育部，2016b）。

其次是高等教育质量切实加强。近年来，我国高等学校的师资队伍质量、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质量都有较显著提高。2012年，我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25.44万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17.66%。我国2012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为90.9%，其中本科院校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为91.5%，高职高专院校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为90.4%。

从学科建设情况来看，2012年至2016年间，我国内地进入世界大学四大排行榜前500名的高校从31所增加至98所，进入基本科学指标（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排名前1%的学科数从279个增加到770个，有学科进入ESI前1%的高校从91所增加到192所。工程教育加入“华盛顿协议”，质量实现了完全国际实质等效。从科研经费的角度来看，我国高校科技经费总额已经高达6531亿元；高校牵头承担了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一大批“973”和“863”等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高校服务企业社会需求所获得的科研经费总额已超过1791亿元，占

高校科研经费总量的 27.4%。从科技成果转化来看,科技成果直接交易额超过 130.9 亿元,发明专利授权量超过全国年发明专利授权总数的五分之一。另外,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各类项目批准立项高达 18700 余项,高校提交各类资政报告 4.3 万篇(教育部,2017b)。从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来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研究生教育大国。2016 年,我国共有研究生培养单位 793 个、学科 11328 个。在学研究生人数 198.11 万,授予博士、硕士学位人数 56.39 万,分别比 2012 年增长 15% 和 16%。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也取得重要进展,2016 年,我国高校科技论文数量占全球的八分之一,部分学科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发表论文数量的排名来看,截至 2015 年,在 22 个学科领域中,我国有 17 个领域分别位于世界前五名,特别是化学和材料科学这两个领域多年排列世界第一(教育部,2017c)。2017 年 9 月国家“双一流”建设名单公布。“双一流”名单包括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 所,其中 A 类高校 36 所, B 类高校 6 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95 所,包括 25 所非“211”和“985”高校。

再次,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机会的民族差异、性别差异和地区差异逐渐缩小,教育机会均等有较明显改善。首先,高等教育机会的民族差异逐渐缩小。2012 年,普通本专科少数民族学生 177.96 万人,占普通本专科学生总数的 7.44%;研究生中少数民族学生 9.94 万人,占研究生总数的 5.78%。其次,各层次高等教育的女性毕业生不断增加,不同性别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渐趋均衡。2012 年,普通高校女性本专科毕业生占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总数的 51.19%;普通高校女性研究生占普通高校研究生总数的 50.04%。最后,高等教育机会的区域差异不断缩小。2012 年华北、东北、华东地区每十万人人口高等教育平均在校生数最多,分别为 3270 人、2714 人、2499 人;中南、西北、西南地区的每十万人人口高等教育平均在校生数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 2219 人、2101 人、1847 人。每十万人人口高等教育平均在校生数最多的华北地区比西南地区高出 1423 人,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比较显著。2008 至 2012 年中,这种地区差异有所减少,每十万人人口高等教育平均在校生数最多的华北、东北、华东地区增幅分别为 -2.25%、6.67%、2.27%,而中南、西北、西南地区的增幅则达到 17.68%、21.82%、27.39%(张男星等,2015)。可见,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正在日渐缩小,教育机会日益均等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公平取得新进展。我国实施的“一省一校”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面

向中西部高校教师学历提升的优惠政策、对口支援西部高校工作、国家农村和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和少数民族骨干招生计划等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大大缩小了高等教育的地区、城乡、民族、阶层和性别差异。

最后，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中国出国留学生居世界第一，而来华留学生数也大幅增长。据2016年《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统计，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45万人，较2012年增幅为36.26%；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总数43.25万人（教育部，2017d）。另一方面，来华留学人数持续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数量增长明显。2016年来华留学规模突破44万人次，同年“一带一路”沿线64国在华留学生共207746人，同比增幅达13.6%（教育部，2017e）。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根据教育部的统计，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的总量为54.5万人，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同时我国也是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有来自205个国家和地区的44.3万人次留学人员在华学习；另外，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日益广泛深入，截至2017年6月，我国已在1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12所孔子学院和1074个中小学孔子课堂（教育部，2017f）。

（二）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发展不均衡和“大而不强”的问题。在教育领域，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广受关注，促进和实现均衡发展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高等教育的不均衡是客观必然的存在，但如果资源分配差异超过了社会良性运转的限度，势必会带来“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不利于社会人力资本的均衡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首先是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历史、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在一些东部的大城市或省会城市，高等教育资源的数量（如高校数量、在校生数量以及校舍和实验室等硬件设施）和质量（如办学质量、重点学科、各类突出人才）等方面都占有优势。《中国统计年鉴2017》显示，2016年全国共有2596所普通高校，其中东部地区有1189所，中部有872所，西部仅535所。另外，如果按每十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来测算，2016年全国平均水平是每十万人口有在校大学生2530人，分别来

看，东部是 2897 人、中部 2484 人、西部 2209 人。具体到省一级，北京是全国最高，每十万人人口有在校大学生 5028 人，青海最低，仅有 1319 人。此外，学科分布上也存在区域失衡，不容乐观。根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按地域看，A+ 学科最多的 5 个省市是北京市（93 个）、上海市（26 个）、江苏省（23 个）、湖北省（14 个）和浙江省（13 个）；A 学科最多的 5 个省市是依旧北京市（39 个）、上海市（27 个）、江苏省（17 个）、浙江省（11 个）、湖北省（10 个）；A- 学科最多的 5 个省市依次是北京市（62 个）、江苏省（40 个）、上海市（38 个）、湖北省（24 个）和广东省（24 个）。而西藏、青海、宁夏、海南、贵州、内蒙古、新疆、广西和山西等 9 省均没有 A+、A 和 A- 学科^①。

其次是高等教育学校发展不平衡。“985”和“211”工程对提升我国整体高等教育水平，培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加快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点可以获得更多国家投资和建设，从而形成累积优势，同时却也带来了不同学校之间悬殊的差距。“985”和“211”工程建设存在的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阻碍了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此外，中西部的普通高校不仅缺乏政府投入和资源配置，而且高等教育的市场动力机制缺少活力，从而导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不断扩大的教育资源差距。为了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解决“985”和“211”工程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国家启动“双一流”建设，统筹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国家“双一流”建设既肯定了以往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已取得的成效，又避免了重点终身制的弊端，突出绩效导向，明确在公平竞争中体现扶优扶强扶持，动态调整支持力度，增强建设的有效性。

最后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平衡。入学机会的地域差异、户籍差异和阶层差异深刻地影响着学生能否享有同等的竞争机会、公正的应试过程和公平的录取结果。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高达 42.7%，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高等教育供给充分，提供的入学机会多，逐步迈向普及化，但不同区域接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差异。例如，北京、上海和天津 3 个省份已实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河南、西

^① 此次学科评估结果首次采用“分档”方式公布，将前 70% 的学科分为了 9 档公布，不公布分数且不排名次。其中，A+ 档为进入全国前 2% 的学科，A 档为进入全国前 2% 至 5% 的学科，A- 档为进入全国前 5% 至 10% 的学科。

藏、甘肃、云南、贵州和广西 6 个省份高等教育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外，除地域差异外，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较显著的差距还体现在城乡之间的差距上。很多研究表明，教育机会获得的劣势具有累积性，农家子弟“上好大学难”肇始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城乡分化。

四、国内有关高等教育获得的研究综述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重要进展。与此同时，不同学科尤其是社会学领域对于高等教育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高质量数据资料的公开以及量化研究方法的日益普及，涌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探讨中国高等教育获得的研究成果。已有的研究关注影响个体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因素及其历史演变，尤其关注教育扩招对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的影响。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高等教育的学校过程（schooling）。

（一）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公平

长期以来，教育被视为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尤其是自 1999 年高等教育扩招后，“谁获得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主要议题。针对高等教育的扩招到底使是教育机会分配变得更加平等，还是扩大了教育不平等，大多数学者都从教育政策和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考察社会历史发展和政策设计如何影响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一个普遍的结论是：改革开放前的教育机会分配呈现“去分层化”状态，改革后尤其是 1999 年高校扩张以来，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呈上升趋势。例如，李春玲（2003）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个人教育获得的历时性影响进行研究，她指出 1978 年是带来中国社会教育机会分配形态变化的重要分水岭的一年。1978 年以前，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获得的影响在减弱；而 1978 年之后，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程度呈现上升趋势。在此基础上，李春玲（2010）基于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一个次级数据集，发现高校扩招并没有缩小各阶层之间的教育机会差距。郝大海（2007）的研究发现，1978 年以前社会政策缩减了优势阶层对教育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教育分层；改革后，中国

教育分层正显现出 MMI (“最大化维持不平等”) 假设的诸项特征: 优势阶层在教育分层体系的升学转化中依旧占据优势。李煜 (2006) 强调了教育不平等产生机制、具体制度设计和社会状况背景三者间的联系, 指出 1992 年后随着改革的深化, 教育体制受市场化的冲击, 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不平等仍将维持。李代 (2017) 基于 A 省某年高考成绩的总体数据, 采用计算方法来模拟扩大招生对不同地区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效应。研究发现, 高分段扩张与低分段扩张带来的效应不同, 前者扩大了教育不平等, 后者则缩小了教育不平等。

除了从宏观层面如教育政策、制度变迁考察高等教育扩招与教育分层的关系, 也有学者从微观层面探讨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 现有文献涉及的微观机制主要包括: 阶层文化、教育策略、教育期望和教育分流机制。从阶层文化这一视角出发的学者强调在阶层结构之外, 阶层文化在教育的代际传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 李煜 (2006) 提出文化再生产模式、资源转化模式和政策干预模式, 以解释家庭背景影响教育获得的机制。他发现 1992 年后, 高等教育阶层不平等通过文化再生产和资源转化两种模式得以维持。仇立平、肖日葵 (2011) 指出家庭背景以文化资本为中介对子女的教育获得产生正面影响。关于教育决策机制, 吴愈晓 (2013a) 从微观决策过程理解中国教育不平等及历史演变, 该研究发现, 改革开放以来, 户口、家庭文化资本和兄弟姐妹人数等影响教育决策的微观机制导致的教育不平等呈扩大趋势。侯利明 (2015)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 将家庭的微观教育策略分为地位下降回避策略和学历下降回避策略, 发现学历下降回避策略是影响子代教育获得的重要微观机制。而关注教育期望的学者大多沿袭威斯康星学派的观点, 强调父母的教育期望、职业热忱和价值取向等会逐渐灌输给子代, 并与学业表现、重要他人等社会心理因素一起, 作为家庭背景的中介变量, 对子代的教育期望和教育成就产生直接、微妙的影响 (Sewell & Shah, 1968)。例如, 王甫勤、时怡雯 (2004) 将大学教育期望看作是教育不平等再生产的中间机制, 发现较高的升学期望有助于高等教育获得, 而升学期望较高的学生多出身于优势阶层。最后, 教育分流机制。从教育分流机制出发的学者关注教育经历和升学路径选择对个体教育获得的影响。例如, 刘精明 (2006) 区分了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教扩招的不同效应: 本科教育主要以地位获得为取向, 而成人教育则以生存维持为取向, 前者使优势阶层获益, 后者为社会下层提供了更多机会。吴愈晓 (2013b) 探讨了重点学校制度和学轨制与中国教育分层之间的关系, 基于 CGSS2008 数据, 他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学生, 越有可能进

入重点高中，而获得重点高中的机会对重点大学有重要影响。唐俊超（2015）指出随着入学阶段的提升，学校等级的作用逐渐显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文化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随之减弱。以上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我国教育不平等的研究。

（二）家庭背景与高等教育获得

高等教育获得的代际流动是社会分层和流动的重要机制。关于高等教育获得差异的解释，主要有精英流动和社会再生产两种理论取向。前者强调现代教育制度的绩效主义原则，即以个人努力和能力为基础的自致性因素在个体教育获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换言之，高等教育“择优录取”的筛选机制促进了社会流动。例如刘精明（2014）探讨了先赋性因素（出身）和自致性因素（能力）对升学层次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出身效应相比，学生能力在普通本科升学中的效用更大，而且学校的质量也越高，对能力（特别是学生的学业能力）的要求也越高。由此他认为，这些都表现出绩能主义社会“唯才是举”的典型特征。梁晨等（2012）依据1952—2002年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学籍卡资料，发现1949年以来高等精英大学的生源逐渐多样化，即中国高等教育系统表现出较大的开放性，有效地削弱了父辈职业阶层对子女精英教育获得的影响。梁晨等（2017）指出不同于欧美国家固化的精英教育体系，中国的精英教育体系相对开放，精英教育群体的社会来源构成，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与多元性。吴晓刚（2016）认为中国教育体制中的重点中学制度和考试制度通过对学生的能力进行筛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削弱家庭背景对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反映出教育可以促进社会流动的公平性。

社会再生产的取向则强调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获得的重要作用，高等教育扩招并没有缩小不同阶层升学结果的差距，恰恰相反，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是父辈优势地位整体性社会再生产的结果。优势阶层不仅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总量上占据优势，甚至获得优质教育（精英教育）的机会也越大。例如，胡荣、张义祯（2006）的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阶层之间并不是均衡分布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子女比商业服务人员阶层的子女获得了更多教育机会。杨东平（2006）发现出身低阶层家庭子女的高考录取分数反而普遍高于优势阶层的子女。尹银等（2014）依据北京某高校2010年和2011年的调研数据发现，自主招生带来很大程度的教育不公平，优势阶层子女更易成为招生的对象。李春玲（2014a）发现尽管教育机会数量增长明显，优势地位家庭的子女有更多机会获得优质教育机会，教育路

径选择显示出明显的阶层分化。丁小浩、梁彦（2010）也发现高校扩招以来，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更易被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获取。吴晓刚（2016）将北京高校分为精英高校、“211”大学和其他非“211”大学三类，发现家庭背景对于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具有直接的影响。此外，各种招生加分优惠政策加剧了优势阶层的再生产。吴晓刚、李忠路（2017）通过对北大、清华和人大的代表性样本的分析，发现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更可能来自父母受过高等教育、城市家庭和来自好的重点中学的学生。以上研究发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中国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发展状况，为深入了解中国高等教育变化趋势提供了经验支持。

（三）高等教育获得的城乡差异

新中国建立以来，户籍制度带来的城乡分割不仅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结构的资源配置，也形塑着不同社会分层体系中个体的人生际遇。目前关于城乡出身与高等教育获得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展开的。例如，李春玲（2010）发现高校扩招后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有扩大趋势。李春玲（2014a）认为无论是高等教育的升学机会，还是学校质量（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农村学生都处于相对劣势的位置。魏晓艳（2017）基于CFPS2010、2012和2014数据，发现城市身份的个体从高等教育代际传递效应中受益更大。刘云杉等（2009）以1978—2005年北京大学录取新生中的农村学生为研究对象，数据显示1995年后，北京大学录取新生当中，农村学生的比例显著下降；2000年以后，农村学生的比例维持在10%至15%之间。与此同时，干部出身的新生比例明显增长。

那么如何解释扩招以来教育机会总量增加但农家子弟上大学的机会反而下降呢？李春玲（2014b）基于2006年、2008年和2011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发现教育存在阶段性累积特征，农村家庭子弟大学升学机会减少可以追溯到初中升高中时期的城乡升学差距。庞圣民（2016）发现城乡间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主要肇始于小学升初中和初中升高中两个阶段，而由后者产生的不平等尤为严重。吴愈晓（2013a）从个体进行教育理性决策的角度，指出农村居民囿于资源和文化资本的限制，更可能主动放弃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

（四）高等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

高等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是教育分层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学者们普遍发现，

从总体上看,男女受教育差距逐渐缩小,但某些女性弱势群体的教育获得远远处于劣势状态。因此,研究中国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的学者主要沿着三条脉络展开。其一是探讨中国教育机会性别差异的演变趋势。例如,李春玲(2010)指出近几十年来中国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机会逐渐和男性无异。甚至在相同家庭出身条件下,女性上大学的机会还高于男性。叶华、吴晓刚(2011)发现1970年以来,随着生育率下降,性别间的教育差距在年轻的出生世代中缩小了。邵岑(2015)通过教育扩张不同时期的比较发现:教育扩张前后,高等教育获得机会均不存在性别不平等,教育扩张导致了中等教育阶段和基础教育阶段教育性别平等化。吴愈晓、黄超(2015)探讨了中国居民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程度、变化趋势的城乡差异,发现城镇居民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程度较小,并且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近年来已经基本消失。而农村居民的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程度非常大,虽然也显示出逐渐缩小的趋势,但缩小的幅度很小。李春玲(2016)指出最近10年,中国女性的教育水平超过男性,女性在学校教育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其二是探讨高等教育获得性别平等化的原因。例如,叶华、吴晓刚(2011)发现随着家庭中兄弟姐妹数量的减少,性别间的教育不平等也逐渐降低。张兆曙、陈奇(2013)检验了影响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机制,他们发现扩招之后女性新增的教育机会主要来自两类群体:父辈文化程度为初中的女性群体和农村地区的女性。邵岑(2015)讨论了教育分流体制对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影响,发现无论是初中升学还是高中升学,男性和女性在教育分流过程中均不存在性别不平等。李春玲(2014b)的研究发现,随着入学阶段的上升(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男女受教育机会的差距逐渐缩小至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机会性别不平等主要存在于小学阶段。

其三是检验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是否存在群体差异。例如,李春玲(2009)发现家庭背景因素的教育地位获得效应对女性的作用大于男性,低阶层出身的女性获得的教育机会尤其更少。李春玲(2010)指出性别不平等与城乡不平等存在交叉作用。吴愈晓(2012)基于CGSS2008,发现影响教育获得的各主要因素(户籍、父亲职业地位指数、父母受教育程度、兄弟姐妹数、不同教育层次入学机会)存在性别差异,农村户口居民、父亲的职业地位指数或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低、兄弟姐妹人数越多的群体,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此外,女性在升初中阶段的低教育层次面临的不平等大于其在升大学阶段的不平等。吴愈晓、黄超(2015)指出

当前中国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而造成农村居民教育性别不平等的因素是因父权制（或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所导致的性别歧视。

（五）高等教育的求学过程

除了探讨高等教育获得和升学机会外，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不同群体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和生活经历，阐明学校过程如何形塑或改造了不同阶层整体的际遇。现有研究从不同议题出发试图揭示“大学的效应”，呈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归纳而言，关注大学生群体在校表现的研究者指出，大学教育促进了社会流动；与之相反，关注科类专业、升学结果的研究者，发现大学四年的教育过程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首先，在校表现。朱斌（2018）认为工农阶层子女在大学中更加努力，学习成绩最好。而精英阶层子女更多地受益于家庭文化资本，他们更可能成为学生干部，英语成绩也更高。许多多（2017）发现，贫困大学生在学业成绩、荣誉获得、社团活动参与、入党、实习兼职等方面的表现都要比非贫困大学生更为优秀，大学四年的经历可以缩小贫困生和其他学生在非认知能力上的差距。

其次，在对于科类和专业的探讨上，谢作栩、王伟宜（2005）发现科类和专业的入学机会存在阶层差异，上层社会子女大多选择那些优势或就学成本较高的专业，而下层社会子女大多就读于一般的基础理论或就学成本较低的专业。刘云杉等（2009）通过对1978—2005年北京大学录取新生中的农村学生的数据分析，发现高校扩招前，农村文科学生聚集在人文类专业，城镇学生比例居高的文科专业是应用型学科与专业。2000年以来，农村新生更集中于冷门专业，如图书馆、编辑与考古学与哲学等，城镇文科学生的专业更突显其应用价值与功利性特征，如管理学、经济学与法学。

最后，对于后续教育机会（未来升学结果）的研究中，李忠路（2016）发现，读研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学业表现都要显著地优于毕业后直接就业的学生。海外读研的学生更多来自国内优势阶层；在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中，家庭背景基本上通过子女本科就读高校的类型和学业表现来影响他们在国内升学（继续就读研究生）。权小娟、边燕杰（2017）通过某“985”高校学生数据，考察城乡背景对大学生在校表现的影响，发现尽管农村大学生学习成绩显著高于城市大学生，农村学生毕业后继续深造和海外留学的可能性却相对较低。

五、总结与展望

(一) 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展望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从规模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另外,近年来强调高等教育质量和内涵式发展的思路和举措,也使得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显著提高,并向高等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本强国迈进。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等多方面的原因,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一个社会事实,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供给的地区差异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和城乡差异等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判断,实际上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现状也是契合的。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也翻开了新的一页。一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反映在高等教育领域,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与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新时代高等教育应把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促进教育公平。

(二) 高等教育研究展望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围绕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不同研究领域尤其是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产出了大量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帮助我们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不平等及其演变。在新时代的起点上,随着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迈进,高等教育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维度将进一步扩展,同样,研究内容和研究主题也将进一步深化。如何突破既有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框架,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发掘有深度的经验性研究,需要学术共同体的长久努力。基于此,涉及高等教育获得或教育过程的若干议题值得关注。

首先，变迁中的大学及其对社会公平的效应。现有大多关于高等教育获得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哪些人上了高校”，而对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制度设置对社会公平的影响探讨较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等教育究竟是缩小阶层差异、实现社会平等的主要机制，抑或是日益拉大的经济、政治、社会差距的起点？高等教育究竟是带来了不同阶层、群体的分化，抑或是对不同群体进行了同化，还是同时保持了分化与同化的平衡？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基于针对性较强的经验研究进行深入的探讨。

其次，家庭、学校结构与高等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都关注到了宏观制度性因素、社会政策和社会阶层结构等对教育分层体系的影响，但对社会再生产的微观结构以及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间的互动和联系的关注明显较为缺乏。微观结构不仅是宏观结构的产物，同时又直接形塑、包含、造就身在其间的个人。因而，在分析高等教育分层与不平等时，有必要关注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间的联系与社会再生产的微观结构和中间过程。微观结构包括学生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场所：家庭和学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迁，高等学校办学体制改革也不断推进，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更显突出，微观家庭和学校结构的变迁都将给个体升学路径产生一定的冲击。

再次，学生在校求学过程的微观过程和机制。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到了微观机制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但对微观机制如何影响学生在校表现的研究尚显缺乏。大学是一个巨大的熔炉，有学生位于中心，有学生处于边缘。每一个学生都以其个体所处的阶层文化逻辑并依其特有的实践和目标，采取他们对待学业梯度和制度化知识的态度和决策。因此，关于影响学生在校表现的微观机制，尤其是师生互动、社团参与、社会关系网络 and 同辈群体对个体的社会行动和主观社会认同的影响，应予以更多关注。

又次，关注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价值观是连接个体经验和社会认同的重要环节，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范畴。青少年时期是价值观形成或多变的阶段，探讨和研究大学生的价值观念现状、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对理解青少年群体或社会变迁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最后，关注大学生从学校到进入社会的转变过程。大学是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是为他们进入劳动力和广阔社会做准备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探讨从“学子”转变为“社会人”的微观过程和机制对完善高等教育人才培

养制度有重要的意义。

要深入探究以上议题，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加强高等教育的数据库建设。科学研究和有效决策都需要高质量的数据资料作为依据。目前我国以高等教育有关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的数据资料仍然很欠缺，尤其缺乏高质量的全国代表性数据。可以说，我们高等教育有关的数据收集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我们对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及其机制的有效认知，也不利于做出科学有效的决策。因此，政府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应大力推动数据收集工作。我们不仅要积极收集以高校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为主体的数据，尤其是追踪调查数据，还要利用大数据的方法和技术获取与高等教育有关的资料。把抽样调查数据与大数据有机结合，充分利用不同类型的数据的优点，将有利于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探讨与高等教育有关的各种议题。

参考文献：

- 丁小浩、梁彦，2010，《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程度的变化》，《高等教育研究》第2期。
- 国家教委计划建设司主编，1990，《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0》，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91，《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1》，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92，《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2》，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93，《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3》，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94，《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4》，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95，《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5》，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96，《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6》，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韩进主编，2004，《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4》，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2005，《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5》，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2006，《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6》，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2007，《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7》，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2008，《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8》，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2009，《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9》，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郝大海，2007，《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侯利明，2015，《地位下降回避还是学历下降回避——教育不平等生成机制再探讨（1978—2006）》，《社会学研究》第2期。
- 胡荣、张义祯，2006，《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机会阶层辈出率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纪宝成主编，1997，《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7》，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纪宝成主编, 1998,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1998》,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99,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1999》,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贾毓慧总编, 2016,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教育部, 1993,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2月13日 (http://www.moe.edu.cn/jyb_sjzl/moe_177/tnull_2484.html)。

——, 1994, 《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 7月3日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77/200407/2483.html)。

——, 1998, 《“985工程”简介》, 5月4日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6183/201112/128828.html>)。

——, 2010, 《各级教育毛入学率》, 2月26日 (http://www.moe.gov.cn/s78/A03/moe_560/moe_1651/moe_1652/201002/t20100226_27063.html)。

——, 2013, 《实施“2011计划”提升高校创新能力》, 3月11日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244/201303/148418.html>)。

——, 2015, 《各级教育毛入学率》, 9月1日 (http://www.moe.edu.cn/s78/A03/moe_560/jytjsj_2014/2014_qg/201509/t20150901_204903.html)。

——, 2016a, 《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7月6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s180/moe_633/201607/t20160706_270976.html)。

——, 2016b, 《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15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 11月4日 (http://www.moe.edu.cn/srcsite/A05/s3040/201611/t20161110_288422.html)。

——, 2017a, 《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7月10日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tjgb/201707/t20170710_309042.html)。

——, 2017b, 《高等教育新变化“三高、三新、两加强”》, 9月29日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20170928/mtbd/201709/t20170929_315706.html)。

——, 2017c, 《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公布》, 12月29日 (http://www.moe.edu.cn/jyb_xwfb/s5147/201712/t20171229_323331.html)。

——, 2017d, 《我国留学工作呈现新趋势》, 3月2日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170301/170301_mtbd/201703/t20170302_297920.html)。

——, 2017e, 《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输出国和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 3月1日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170301/170301_mtbd/201703/t20170302_297922.html)。

——, 2017f, 《数据看变化·教育整体情况》, 9月28日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20170928/sfcl/201709/t20170928_315533.html)。

——, 2018, 《教育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39号建议的答复》, 1月9日 (http://www.moe.gov.cn/jyb_xgk/xgk_jyta/jyta_ghs/201801/t20180109_324119.html)。

- 李春玲, 2003, 《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1940—2001)》, 《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 2009, 《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家庭背景对男性和女性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 《妇女研究论丛》第1期。
- , 2010,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 《社会学研究》第3期。
- , 2014a, 《“80后”的教育经历与机会不平等——兼评〈无声的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 2014b, 《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 (1940—2010) ——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考察》, 《社会学研究》第2期。
- , 2016, 《“男孩危机”“剩女现象”与“女大学生就业难”——教育领域性别比例逆转带来的社会性挑战》, 《妇女研究论丛》第2期。
- 李代, 2017, 《阈值依赖的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以A省某年高考数据为例》, 《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李煜, 2006, 《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 (1966—2003)》, 《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李忠路, 2016, 《家庭背景、学业表现与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 《社会》第3期。
- 梁晨、董浩、任韵竹、李中清, 2017, 《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转变 (1865—2014)》, 《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梁晨、李中清、张浩、李兰、阮丹青、康文林、杨善华, 2012, 《无声的革命: 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 (1952—2002)》, 《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刘昌亚主编, 2016,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刘精明, 2006, 《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 1978~2003》, 《社会》第3期。
- , 2014, 《能力与出身: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机制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
- 刘云杉、王志明、杨晓芳, 2009, 《精英的选拔: 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 (1978—2005)》,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5期。
- 牟阳春主编, 2000,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0》,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 2001,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1》,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 2002,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2》,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 2003,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3》,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庞圣民, 2016, 《市场转型、教育分流与中国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 (1977—2008) 兼论重点中学制度是否应该为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买单》, 《社会》第5期。
- 仇立平、肖日葵, 2011, 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权小娟、边燕杰, 2017, 《城乡大学生在校表现比较研究》, 《中国青年研究》第3期。
- 人民网, 2017, 《努力让十三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就》, 10月17日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17/c414305-29590520.html>)。

- 邵岑, 2015, 《教育扩张与教育获得性别差异 (1978—2008)》, 《青年研究》第2期。
- 唐俊超, 2015, 《输在起跑线——再议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 (1978—2008)》, 《社会学研究》第3期。
- 王甫勤、时怡雯, 2014, 《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社会》第1期。
- 魏晓艳, 2017, 《高等教育代际传递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谁是“学二代”》, 《中国经济问题》第6期。
- 吴晓刚, 2016, 《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来自“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初步发现》, 《社会》第3期。
- 吴晓刚、李忠路, 2017, 《中国高等教育中的自主招生与人才选拔: 来自北大、清华和人大的发现》, 《社会》第5期。
- 吴愈晓, 2012, 《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 《社会》第4期。
- , 2013a, 《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 (1978—2008)》, 《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 2013b, 《教育分流体制与中国的教育分层 (1978—2008)》, 《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吴愈晓、黄超, 2015, 《中国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城乡差异研究——基于 CGSS2008 数据》,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2期。
- 谢焕忠主编, 2010,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2010》,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 2011,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2011》,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 2012,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2012》,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 2013,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2013》,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谢作栩、王伟宜, 2005, 《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研究——从科类、专业角度谈起》, 《大学教育科学》第4期。
- 邢志宏、叶植材总编, 2017, 《中国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许多多, 2017, 《大学如何改变寒门弟子的命运: 家庭贫困、非认知能力和初职收入》, 《社会》第4期。
- 杨东平, 2006,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扩大之中的阶层差距》,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1期。
- 叶华、吴晓刚, 2011, 《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 《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尹银、周俊山、陆俊杰, 2014, 《谁更可能被自主招生录取——兼论建立高校自主招生多元评价指标体系》,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6期。
- 张男星等著, 2015,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报告 2013》,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张兆曙、陈奇, 2013, 《高校扩招与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08) 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朱斌, 2018, 《文化再生产还是文化流动——中国大学生的教育成就获得不平等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1期。
- Sewell, William H. & Vimal P. Shah 1968, “Parents’ Education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and Achie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 吴莹